

焦點熱議

陳光南

本月底舉行的立法會九龍西地方選區補選，李卓人的選舉策略是將補選說成是反對派和建制派的「決戰」。李卓人高舉反對「明日大嶼」大旗，說投票給他，就可以防止「明日大嶼」花光香港的財政儲備；他進入立法會就會投票反對「明日大嶼」。但反對派在立法會的實力，根本就不可能推倒「明日大嶼」，李卓人擺明是欺騙選民。

「放空炮」被選民識破

結果，反對派陣營不少人都認為，李卓人如此「放空炮」，只會趕跑更多選民，特別是中產階層，這次補選很可能落敗，他根本拿不到10萬票；《蘋果日報》更加說：「評估李卓人勝算低於五成」。所以，反對派準備出動李柱銘等反對派重量級人物落區為李卓人站台，希望能夠保住中產票源，實在是前景堪虞。

特區政府已將「明日大嶼」的人工島功

能講解得很清楚。第一，解決大量人口居住新界，但就業地點集中於港島中環和九龍半島的不合理布局，利用交椅洲鄰近大嶼山，能直接駁通港珠澳大橋的優勢，將人工島打造成第二個中環，增加10多萬至20萬個職位，新界居民只要半小時車程就可以到交椅洲上班；第二，解決香港的產業高科技化，需要和大灣區城市能夠有快速系統聯接，解決高效率車流、物流、人流、資金流的問題；第三，解決土地不足問題，增加土地興建房屋，同時掃除阻礙發展新界「棕地」的障礙。

李卓人和反對派反對「明日大嶼」的理由是香港已有很多土地，只是政府「不願意開發」，香港沒有填海建造人工島的需要；如果填海造島就會花光庫房萬億財政儲備，令香港陷入財政危機；即使填海完成了，將來氣候暖化，海水也會淹沒人工島。

反對派的說法，沒有科學根據，沒有數據支持，也缺乏起碼的常識。這種做法就像

李卓人倒港人米必然慘敗

他們煽動一位老婆婆提出司法覆核阻撓興建港珠澳大橋一樣，當時老婆婆提出所謂影響健康的「理據」荒謬可笑，結果大橋工程停頓了一年，建造費用增加了65億元。現在大橋建成了，而那個老婆婆仍舊活得健康。

中產階層都是有學問有文化的人，清楚知道今天全世界展開第四次工業革命，人工智能和數碼科技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和生產形式，很多工作崗位將會被機械取代。香港作為環球金融中心、世界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也需要轉型，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粵港澳大灣區攜手合作，將香港打造成科技創新中心，找尋新的經濟增長點，令香港繼續繁榮下去。

大敗伏線早已埋下

李卓人和反對派反對「明日大嶼」，其實反對香港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反對香港發展創科、反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最終

只會砸破香港人飯碗，這必然與希望香港提高競爭力、希望尋找經濟新出路的中產階層背道而馳，導致大量中產選票流失。

李卓人妙想天開，認為反對派在九龍西2016年時曾經取得16萬票，現在他只要取得15萬票就可以贏了。但事實是今年3月的九龍西補選，反對派僅取得10萬票，原因是姚松炎的「激進本土」路線，被中產和基層選民唾棄。現在李卓人採取更加激進的策略，高舉反對「明日大嶼」旗幟，違背社會大部分人的利益和訴求，自然會輸得更慘。

目前新界「棕地」有1300公頃，但分布分散，不單難以收地，更不能發展為完整的社區，如果要将「棕地」發展成零碎的小社區，道路基建的投資更加巨大。反對派清楚知道發展「棕地」困難，但仍故意引導香港向著「棕地」的死胡同走去。

現在香港尚欠1200公頃土地應付發展，而公屋輪候時間已增加至超過5.3年，若不進行填海如何能夠解決土地不足問題？如果

「明日大嶼」上馬，政府就擁有巨大籌碼，可以加快與地產商談判，盡快發展新界土地；否則的話，將來這些土地不會獲得優先發展，就不可能有好價錢。地產商屯地不願意發展，是過去十幾年「棕地」的死結無法解開的重要原因。反對派反對「明日大嶼」，其實是為地產商服務，讓地產商更加有本錢壟斷香港的樓價。希望買樓的人發現李卓人是要倒中產階層的米，明益地產商，當然會對李卓人採取抵制的態度。

年輕選民唾棄李卓人，還因為他是早應該退下來的「老油條」政客，年紀大難有新作風和新思維，但他仍然想死抱著既得利益、不想退下來。他還利用不搞所謂「初選」等不民主手法，試圖阻止反對派另一資深成員馮檢基參選，食相非常難看，大敗的伏線早已埋下。

立法會九龍西地方選區補選候選人尚有伍迪希、曾麗文、陳凱欣

資深評論員

時刻銘記歷史教訓 推動中日關係前行



教育茶餐廳
何漢權

美國仍是當今經濟及軍事最強國，但近年「美國優先」及保護主義抬頭，公平、公義、誠信等普世價值都

顯得軟弱無力，且愈來愈墮後。自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主宰美國政府行政力量之後，一條又一條的國際條約都被撕毀，由軍事到經濟，再到環保各個範疇，都無一幸免，更威脅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向美國不合理、不合情的「雙邊」關係說不，否則後果自負。

單邊獨贏思維主導的美國政府，欲阻止中國成為創科強國的同時，日本也得再仰山姆大叔的鼻息。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成為僅次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美國遂發動貿易戰，令日本泡沫經濟爆破；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日本經濟也不能超越美國。

在此時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值中日友好條約簽訂40周年的之際訪華，分別與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會面。回首前塵，中日兩國雖是近鄰，但過去七年兩國關係陷入低谷。從教育角度看，兩國關係的未來發展，還是必須要從珍惜歷史說起。

中國唐代盛世，文明文化璀璨，領先全世界，日本僧人、使節渡海到中國學藝取經，並將中國文化、技術帶返日本，造就日本的大化革新；明末衰世，日本倭寇在中國沿海橫行；清末力拒列強，圖藉洋務運動強國力，與此同時，日本亦展開明治維新實行全面西化，兩國引進西方知識、技術的比試場地竟是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戰勝後透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巧取豪奪，收穫甚為豐碩；清亡到民國北洋政府成立，再至國民政府執政，中國都在力圖振作，卻乏力非常，主因是列強末有忘懷侵略中國，軍事、政治、經濟一齊來，列強侵略之手，以日本軍國主義是最大最黑，害中國老百姓最深；新中國成立，建國艱難，調整、鞏固、充實，一步一腳印，從錯誤中改良前進。

1978年鄧小平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主導中國向前邁進。起步之初，萬事缺人才與錢財，日本確實曾有大送暖，給予中國不少援助，這些都是歷史事實。直至2010年的科學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總體經濟實力已超越日本，與此同時，日本又開始不承認侵華的史實，處處仗著美國背後支持，不斷挑釁。這又是過去七年裏的事實。

如今，曾否認日本侵華的日揆安倍訪華，筆者期望日本政府明白，中國政府及老百姓是從中日友好，以及世界大局勢與雙贏的思想出發，因此予以禮遇接待，展望未來，記取歷史教訓，永遠是中日關係發展的最佳動力！唯有認知過去日本侵華史，才能提煉未來的中日友好關係。

改革大學收生制度 拓闊多元升學途徑



港事港心
梁錦松

我們都知道，大學收生是現時整個中、小學學習階段發展的一支重要指揮棒，它一路牽引中小學課程發展、學習空間與學習方法，大學如何收生，中小學的教與學就得配合。

現時大學聯招收生制度，各院校主要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成績作為取錄標準，很少考慮學生其他方面的學習經歷與專長。由於大學收生指揮整個中小學學習的生態及經歷，整整六年中學，教與學共同目標都只為應試考取高分以考入大學，這樣的制度未能很好地迎合學生不同方面的能力、興趣和需要。

不少教育界的朋友向我說，問題出於教資會和大學。一個例子是，聽說大學當局特別緊張錄取學生的成績，緊盯收生的平均值。為什麼呢？因為收生的成績一低，整個院系、院校的平均值就被拉低，大家害怕這方面會影響將來的資源撥款，平均值背後隱含的是一些資源分配的問題。

一試定生死礙全人教育

既然我們不斷在講世界劇變，我們的教育要讓學生擁有廣闊和充實的知識、全面的素養和正確價值觀的全人教育，那大學收生時就必須考慮學生整個人的學習經歷（portfolio），而非狹窄的只以單一的考試成績指標，去決定他能不能讀大學。

猶記得當時教改，我們推動三改四改革，並將三個考試：學能測驗、中學會考、高級程度會考（AL）縮為一個，目的也是希望通過大學改制推動課程改革。既然大學收生牽引中小學課程及學習方法，而光看DSE成績會窒礙全人教育的發展，我們是否應該思考、討論改善大學收生和考試呢？

最近，我們鄰近地區新加坡，其教育部就在九月新學年開學時宣布「廢除考試」。未來三年，在小學三年級和五年級，中學一年級和三年級，試行取消中考試，在學生的成績報告書，也不再有排名。新加坡教育部表示這項改革是為免過於關注分數，消除不必要、不健康的比較，讓學生有更多時間學習新知識新科目，教師也有更多空間去探索。新加坡已起步向前走，我們更不容怠慢

，對此，我和教育2.1先拋磚引玉，提出兩個建議：

第一：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院校在收生時擔心「平均入學成績」平均值的高低對爭取資源潛在影響，那教資會是否可以在這方面釋除疑慮？取消院校有關收生方面的排行，讓大學方面在收生時，不單只是狹窄地只看DSE的成績分數。事實上，UGC的Funding本身亦是牽引大學收生的一支指揮棒，教資會可以、亦應該考慮在這方面如何改變大學。

第二：消除院校疑慮後，釋放院校的收生彈性與空間，鼓勵院校收生時更多地去參考各種能夠反映學生全人發展的證據，如「學生學習經歷／概覽」，以及中學校長的推薦，並且提供面試的機會。

大家可能知道，美國大學收生，非常重視要有一個很好的「自我介紹」，既讓申請者去說自己的「故事」，亦讓大學在面試時，從中挖掘出申請學生很多方面的才華。當然美國大學也看考試成績，SAT也有分數要求等等。但我必須指出的是，美國不少有名的大學例如哈佛，其實只是一半看成績，另一半是看學生的其他經歷，包括社會服務。況且，美國一年有六次機會報考SAT，亦不是只有在中學最後一年才可報考，可分多年；香港一年只有一次DSE，是高中最後一年，是名副其實的一試定生死。

另外，分數不一定是能力最佳的評估。舉個例子，一個學校辯論隊，甚至是最佳辯論代表，但他可能因一些原因DSE失手，語文成績達不到level 3，我們不可以就判定他的語文能力差，恰恰相反的是，這學生其實語言運用相當有能力。

又例如經常參加科學展、國際數學比賽的學生，他的學習經歷怎樣也比只是考獲一科物理、數學成績好而更加豐富。廿一世紀資訊知識大爆炸，就以數學為例，1900年所有的數學知識只可以塞進1000本書裏，到2000年已經需要10萬卷書去裝。要學生花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幾年時間，反覆學習記誦有限的知識，再去考核，其實是相當低效的學習方法。而且，新知識不斷湧現，在網上花幾秒鐘就可以查閱，所以重要的是有終身學習的能力和興趣。

考試成績不代表一切，DSE的分數之外，其實從學生的學習經歷，可以比較好地看到學生的全面履歷：音樂、運動、辯論、學生組織、社會服務和其他成就。另外大學給學生面試機會也非常重要，讓他們展述自己的興趣、能力和志願。大學在這一環這樣一

拉鬆、拉闊，我相信整個中小學的學習生態就會跟着改變，重新調整教與學，讓學生有全人發展。

必須指出，在討論、研究改變大學收生和考試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兼顧公平問題。家庭經濟和社會階層較好的學生，會有較多的體驗式學習機會。整個社會包括政府、學校、工商專業界和其他機構應一起研究，如何讓基層學生也享有適切的體驗式學習機會，這亦是教育2.1成立大教育平台的原因。

多元出路擴闊大專學制

大學收生問題之外，第二個我要說的是擴闊大專多元學習機會的問題。

我們一再強調終身學習，世界發展機會多元，學生能力和興趣多元，那我們提供的教育機會也是否多元？大學始終非所有學生唯一的一條出路，那我們的教育在中學後這個階段，是否能夠提供更多元的機會，給那些無法或無意升讀大學的學生呢？直接地說是大專機會能否應該再擴闊一些？

很高興見到特首今年將「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資助學額從每年一千個，恆常化增至三千個；自資副學士學位19／20年開始，每年增加兩千，連續兩年，但仍遠遠滿足不到70%的需求。

教育界有一些估算，可以有望達到3322門檻的中學生應該少於一半；另外，多於一半的學生，可能早於一分組別時，已令他們輪在起跑線，失去入大學的希望，我們要思考有什麼誘因可以吸引這些學生亦可以多元上進、全人發展？

拓闊大專學制的設計，多元收生，多元供應、包括高階的專業和職業教育，或許才是這些學生的出路。

作為前任教資會和教統會主席，今天提出這些問題，是因為我覺得這兩個問題：改變大學收生、和提供多元的大專教育機會，是最有效推動全人教育。

事實上，大學收生可以如何改變，不是政府說了就算，因為这不單是資源問題，還涉及UGC、院校能否甚至願意做的問題，還有其他重要持份者——家長、僱主，他們的意見也很重要，因此我希望整個社會都要去思考去討論，討論如何透過改變大學收生、增加多元大專教育機會來推動每一個人都享有全人教育，讓年輕人可以在未來複雜的世界迎接新的挑戰。

教育2.1召集人、大教育平台督導委員會主席

香港與雄安可以怎樣合作？

今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的批覆，肯定雄安新區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性。《綱要》指出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不過由於兩者是在不同時段發展，其建設目標及策略均截然不同。筆者日前參加港區政協河北考察團，對香港和雄安發展有些思考。

打造綠色創科經濟特區

深圳經濟特區建設始於國家改革開放初期（1979年），當時國家條件甚差，經濟落後，資源亦十分貧乏。深圳市政府立志盡快提升特區的國際競爭力，策略性地選擇發展高端製造業及創新科技企業，並積極與香港企業合作。在香港的配合之下，在過去40年深圳市發展迅速，成績全球有目共睹，不但已達到預期的目標，其社會整體發展甚至是超越小康，並且努力不懈地繼續往前推進，邁向富裕。因此，深圳發展的成功經驗的確

是很值得雄安新區借鏡。改革開放40年，隨着國家經濟逐漸發達，社會平均步進小康，把雄安新區建設與深圳經濟特區起步時相比，實在站在較前的「起跑線」。

雄安新區末來除了要顧及冀、津、京及其他城市的進駐人口之外，港澳台及國際移民也是新區人口發展的目標，因此新區必需創造「共享生活」的宜居環境，不然的話，便難以吸引國（境）內外人才及企業落戶投資創業。深圳從零到有，城市發展速度驚人。雄安新區卻要有到好，難度更高，未來發展必須追求品質。根據《綱要》，雄安新區的建設目標是到了2035年，成為「基本建成綠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業、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影響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水平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

深圳經濟特區以經濟驅動建設，當地政府充分利用「先行先試」、「摸着石頭過河」的戰略，因應當刻的資源條件，逐步發展不同區份，以羅湖區率先，繼而發展南山區

、蛇口區、龍崗區等。另一方面，國務院關於《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的批覆文件明顯指出國家對雄安新區具科學化的宏觀整體規劃非常重視。由此可見，從策略管理學而論，雄安新區規劃概括地是由上至下，而深圳則由下至上，兩個方法各有千秋，如何選擇因實際市場情況而定。

值得河北省政府注意的是在考察意見反饋會中，有委員提出中央規劃雖具策略性及宏觀視野，但要達到預期效果，必須要「貼地氣」。以經濟發展為例，政府必須多鼓勵不同企業（包括經驗豐富的港商）積極在雄安新區落戶營商，從中多聽取他們的意見及建議，適時調整和改善已有的規劃。

雄安新區將會在區內1770平方公里範圍，建設「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及「開放發展先行區」。計劃旨在把雄安新區構建成為高品質、高水平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

在河北省發展雄安新區建設的同時，香

港亦正積極參與國家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雖然，「大灣區」和雄安新區的建設規模不一樣，但兩區銳意發展成為國際頂級創新科技經濟特區的目標是一致的。

因此，雄安新區和香港有不少可以互相學習、互相借鏡的地方。以下是筆者三項意見及建議：

與港互相借鏡合作發展

第一，香港的大學屬於國際一流水平，香港有五所大學在QS全球大學2019排行榜上名列110名之內，當中學校國際化和科研成就是評審的主要因素。在落實雄安新區的「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建設的過程中，「雄安」可多與香港各大學協作，例如邀請香港的大學在區內開設研究院；引入香港專家學者進行合作科研；提供實習工作崗位讓香港大學生參與「新區」創科工作等。要達到這此目標，筆者進一步建議兩地政府成立「冀港協同科研及教育基金」，積極資助兩地

合作項目。

第二，香港連續多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經濟自由度指數」是根據「法律制度」、「政府規模」、「監管效率」及「市場開放度」等四大項目作為評分標準。這四大指標正是香港「軟實力」的基石，相信對雄安新區建設「開放發展先行區」很有幫助。

因此，本人建議「雄安」與「香港」不同商會組織工商界聯盟，以市場經濟模式推動「先行區」發展。這做法一方面可以讓「雄安」企業家了解香港的「軟實力」，另一方面也可讓港企在雄安新區尋找商機。

第三，上述建議可以逐步推行，雄安新區於初期可以邀請香港駐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企業，及在當地已有合作研究項目的教授團隊進行合作，然後逐步擴大；引進香港本地工商業及高等教育界，以2035年為目標，達至全方位的協同創新。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